

史炜◎著

中国

式

的市场化
究竟怎么走

ZHONG GUO SHI DE
SHI CHANG HUA
JIU JING ZEN ME ZOU

图
集
版
社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广
东

ZHONG GUO SHI DE
SHI CHANG HUA
JIU JING ZEN ME ZOU

F123.9/64

2007

史炜 著

中国

式

的市场化
究竟怎么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 / 史炜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0728 - 590 - 8

I. 中… II. 史… III. 电信 - 邮电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63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527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员村五横路大坦工业区 3 号楼首层)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9.25 2 插页
字数	224 000 字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数	1 ~ 1 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80728 - 590 - 8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门市部地址: 广州市五羊新城寺右二马路冠城大厦省图批新场三楼 330 号

电话: [020] 87395594 87393204 邮政编码: 510600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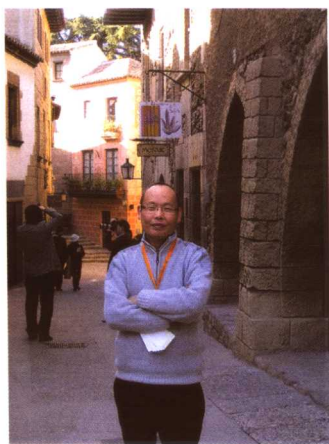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电话: (020) 37601950 37601509

图书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屠朝锋律师、刘红丽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史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电信国际投资论坛专家组成员，中国房地产协会顾问。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电信、房地产、企业改



制、商业流通研究。已出版个人专著 7 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担任 50 余项课题研究负责人，由其负责的研究课题分别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近 20 年主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政策性研究项目，此外，为国内大型企业及在华著名跨国公司完成了近 40 余项咨询研究。是多家跨国公司的战略顾问，在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近 5 年，史炜的研究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电信产业，对电信发展政策、运营商战略、中国 3G 战略、外资进入中国电信业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由史炜本人领导的“中国电信业发展研究小组”，这些年在国内研究业绩突出，是中国最重要的电信问题研究小组之一。此外，为国内多家大型公司设计了股份制改造方案及上市准备研究方案，参与了多家公司市场战略的研究及操作方案的顾问工作。特别是近两年，直接参与了多家城市的整体规划方案的研修工作。

自序

市场就像一座火山，沉睡的时候，万物皆静，没有生气；爆发的时候，万物皆哀，没有生命。市场更像一匹烈马，缰绳勒得太紧，马鬃虽扬，但寸步难行；完全放开缰绳，天马行空，却可能马失前蹄。

从 20 多年前的“猫论”到今天建立和谐社会，市场的地位在中国已今非昔比，市场的作用在中国日益得到重视和认识。市场是润滑剂、是孵化器、是罗盘、是动力增速机，但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市场终归不是万能的。

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应该是我们今天科学认识市场经济的前提。

俄罗斯的经验说明，大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是一个历史发展和演绎的过程。在社会政治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激进的、革命式的手段是寻求新秩序建立的最有效方法，成本虽高，但相比旧秩序的沉痾，再高的成本也是划算的。这就像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样，虽然国家承受了多年内战的破坏，但在全新的秩序下，所焕发出的政治与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

经济活力足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处在相对稳定发展状态的时候，尽管旧秩序中的很多弊端正在影响社会经济向更高效、更高速、更理想状态的发展，甚至更多的时候许多人期望用激进的方式打破旧的秩序，比如，对社会经济所涵盖的市场组织方式完成一次革命性改造等。然而，大家很快就发现，整个社会，包括各阶层人民对新秩序的承载能力、承受能力其实比预期的要低得多、脆弱得多。为建立新秩序所付出的成本足以抵消新秩序可能带来的收益，甚至最终葬送了新秩序。所以，市场新秩序的建设是不可能因为一次激进的行为而自发地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在各种配套要素都极度缺失的情况下像做一道排列组合题那样轻松地完成。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来讲，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的转轨都是如此。企图一夜建成“市场经济新秩序”，往往会事与愿违，不得不付出长期的努力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

在中国式市场经济中，最难破解的两个字就是和谐。穷人和富人的关系是和谐问题，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关系是和谐问题，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和谐问题，东西部经济的平衡是和谐问题，进一步扩大开放与民族产业的保护是和谐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是和谐问题。

今天，如果孤立地谈市场经济发展及所涉及的改革问题，面临的所有障碍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当把市场置身于社会关系，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社会进步与财富集聚的关系，既有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中来考察，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型则面临诸多难以跨越的沟壑。

中国今天所遇到的发展问题，有许多情况在欧洲和美国的工

业化后期都曾经出现过，如社会收入严重失衡、寡头垄断、社会保障滞后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就业压力与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等。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等国一方面继续完善各自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关法律的建设，保持经济尽可能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家财力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平衡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国家采取推倒重来的办法，而无一例外都采取了温和疗法，以化解、分流、弱化、平衡的方式，经过近 20 年的时间，修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间的裂痕。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一书，希望展示的正是笔者这些年参加各种经济改革研究过程中，对市场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解。这本书的写作准备了 5 年，多次弃稿重写，原因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面临的问题不但复杂，而且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为了写这本书，笔者首先是在自己的新旧思想博弈中产生火花和观点的。书的整体结构也因此不像很多学者的著作那样，文辞严谨、逻辑清晰；这本书更像是随感和写实。当然，对许多经济问题，笔者也试图用社会学的眼光分析它，用文学的语言描述它，力求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语言予以解剖和分析。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这本书，是笔者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以来写的第八本个人专著，是文字最少的一本书，仅仅 20 多万字，也是写作耗用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写了整整 5 年，现在觉得五脏六腑都被这本书给彻底掏空了。写完了这本书，笔者再次成为一个无产者，一切应该都是新的了。

非常感谢广东经济出版社和毛世屏社长，是他们激发笔者在疾病中下定决心完成这本书，并在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笔者极大的支持。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

我也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为我安排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使我能静心思考、安心写作。

最后笔者想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绝不是一本书能说得清楚的。探讨市场经济的创新体制，仍将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史 炜
2006 年 10 月

我所能想到的，从这里写起

（代前言）

2006 年过得很快，眨眼又到年底了，学者们的聚会也显得多了起来。与往年不同，大家见面都在说累，都在谈放弃，都在讲“不行，兄弟要歇了！”

国庆节后的第一天，我写完博客《天鹅之死》。其后，我一直走不出文章的影子，天鹅的翅膀似乎罩着我，让我压抑和喘不过气来。也许真的是年龄大了，今年以来，我每每写一些随想的东西，都会深陷其中。写《唐山大地震 30 年祭》，我整整一个星期都沉陷在看不到边的地震棚中，脑子里全是 30 年前的情景；写《纪念毛主席逝世 30 周年》，我同样再次回到 1976 年那段不平静的岁月里。

这次，应广东经济出版社之邀，撰写了这本新书，暂定的书名是《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原本定好 9 月底交初稿，但近一个时期脑袋总是涨疼，想的事不但多，而且杂。出版社催稿，我硬着头皮紧赶。

这时，我的心不在书里，还在《天鹅之死》的旋律中。

过去写书，都是意气风发的，但 40 岁以后写书的时候，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这本书在我



的脑子里已经搁了5年，也曾完成了部分章节，但都又扔到一边去了。本来2001年已经与广东经济出版社初步约定下写此书，但后来由于各种事情，加上疾病牵扯，只得爽约。

到了我现在的年龄，写书已不再是为了出名和赚稿费，写书的目的就像我在博客的题头中写的：“把每天说的话、想的事写成文字，就成了博客。博客其实很原始，就像原始人在岩石上画符号记事，都是怕把昨天给忘了。”书，其实也很原始，我一直认为只要会写字，能把自己心里想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东西梳理清楚，你就一定能写书。写经济学的书比写诗、写小说要容易得多：写诗，你必须先把自己折腾成为一个疯子；写小说，你必须先把自己捣鼓成一个傻子。写经济学著作不同，你只要泡一杯浓茶，把家里的写字台换成最大规格的，一盏若暗若明的台灯，摆一张高背的藤制靠椅，嘴上叼上一支焦油含量小于0.5毫克的中南海牌香烟，桌子的左边码一叠全中国的报纸，桌子的右边是全世界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桌子的中间放置一台日本索尼最新款的超薄型笔记本电脑外加一根网线，写作就可以开始了。过去的刀子、剪子、糨糊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彻底抛弃了。手指头一动，天下为我，我为天下，一切均在经济学家们的掌控之中。

当然，更有一些已经经历“天鹅之死”的著名经济学家，看破红尘，远离过去比自己亲爹亲妈还要亲的政府部门，手持一张机票，走遍大江南北。一年365天，他们至少有300天在各种讲台上高谈阔论，一份讲稿打天下，百万钱币囊中藏。这算是在天鹅之死后脱旧俗入新俗的人。更有“大彻大悟”者，一手伸进大企业的财务室，在被企业金钱俘获后，出卖了良心当吹鼓手，其乐融融！

当然，还有些人沉湎在自以为是的真理中孤芳自赏，却不

知，他兜里的真理早就成了垃圾。这些人至死也没有找到天鹅湖，只能是生的平庸，死的不伟大。

所以，经济学家们要想给世人留点好印象，也需转型，至少经济学的言论、文章应是思想的原创。

笔者不是经济学家，至多只能算一个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但近 5 年来，在我所带领的研究小组中，一贯主张原创。

原创使研究变得异常的累，也经常会与那些习以为常的、早就不是原创但又被尊为标准的理论发生冲撞。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在学术界，2005 年发生的一系列鲜有的现象，才是学者转型的最大起因。首先，是由 2004 年郎（咸平）顾（雏军）之争至科龙公司事发，引发了广大非专业经济人士对经济学家的万炮齐轰；随后，香港的一位内地人素未知晓、在国际上也未见经传的教授称中国内地算得上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 5 个；紧接其后的是是一位副部级经济学家型官员的关于工资不宜快涨的言论遭到网民的围攻。

所有的这一切，从表面看，论及的是中国内地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学术道德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经过近 30 年快速发展后，经济学者价值取向的一次转型。

今天，许多全新的问题不但摆在经济学家面前，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展露在每一个老百姓面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30 年前，如果有一家国有企业让其正式职工下岗，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30 年前，如果有一个农民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并让更贫穷地方的农民来给他种田，又会是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让职工下岗的国有企业领导定会被指责为旧时代的剥削者，而那些大规模的土地承包者会被状告为吸农民血的恶霸地主。财产关系的

变更，彻底颠覆了 30 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市场及市场分离出的各种细胞，已渗入每一个经济学家的血管之中。

今天，对这些问题，老百姓已经认可了；或者说不认可也得认命了。学者们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其予以理论的认定。但是，当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贫富差距超过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腐败成为最典型的社会弊端，学者们与大企业家的联系远远比与百姓的联系密切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与其说大家在骂经济学家们，还不如说大家在发泄一种不满。

我想，这种不满或许就是近 30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副产品，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不满成为一种社会的矛盾时，经济转型就肯定要启动了，而经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也将开始转变。

只可惜，面对当前形势有的经济学家选择了逃避；有的去学屈原跳江了；有的学李白水中追月了；有的学陶渊明弄花戏草去了；有的学曹雪芹，假是真来真亦假；还有当“愤青”的，学鲁迅，谈《殇逝》、写祥林嫂去了。而一批初生牛犊，朝气蓬勃、血气方刚，他们饱读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挥笔研判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问题，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所研判的理论与中国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海外归来的研究者，甚至因为研究思路不切合实际而由“海归”被改称为“海带”。

近 30 年，中国内地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旧体制的改革问题。而在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学者们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垄断时代的发展方式、国际竞争策略和途径等；面临着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政制改革及和谐社会建立、反腐败与缩小收入两极分化等比提高增长速度更为复杂和难以破解的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

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了，他们为利益集团服务而非履行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不会敏锐地发现经济转型对学者们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在转型中，他们成为众人的靶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评价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而在于提醒学界切实要关注转型问题。现在大多数学者还在用“九五”和“十五”计划时期的思想研判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比如，引入式的资本运作，技术引入及集合式的公司升级，制造业输出式的加工贸易，国有企业资本转换及 MBO 等。对于这些类同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问题的研究，今天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应用性，但对经济学者来讲，重新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才是转型期的核心内容。比如，传统发展方式是“加法和减法的问题”，煤多了，价跌，随后必是短缺；价再涨，一涨必多，再跌。钢铁也是如此，钢少，国家建新钢厂；钢多，全力限产。对于这类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或许是正常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后，就必须重新认识这种资源浪费型的“加减法模式”了。这时，再搬出凯恩斯和新供求学派甚至自由经济主义，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笔者认为，研究发展方式将是转型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或许也会得到调整和修正。

这几年，笔者在给北大、清华、中山大学等院校的 MBA 班讲授“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分析”课程的时候，学员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究竟算不算市场经济？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能给学员们一个完整、准确的答案。因为学员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

2006 年初，当我再次去浙江调研的时候，看到过去的造假者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

今天已变成品牌产品制造商，看到过去的前店后厂正在被规模化的加工业基地所取代，而所有这一切的变化仅仅是在几年内完成的。我感慨地对陪同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但回到北京后，与一些学界的朋友聊天，发现许多曾被认为是学界精英的朋友，正在放弃他们成果辉煌的研究领域而转身于咨询或讲学。问其原因，许多人说：给政府作咨询研究，作得心有些痛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太低，简单的事往往被复杂化，决策研究更多的时候成为各个部门争名夺利的场所，作研究像雾里看花，让人心很累。而更无奈的是决策程序的部门利益化和个人意志化，使再好的决策咨询方案都会被一双“闲不住的手”牵制着，很难形成预期的效果，甚至在更多的时候，会成为一堆废纸。与其这样，倒不如给企业作一些咨询，好歹也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货交易”。再看开些，就索性靠着个人品牌在各地讲课，既轻松，又能得到听众们近于崇拜的掌声和赞许，还能大把大把地挣钱；尤其是能摆脱决策研究中的“是是非非”，心口自然也就不痛了。

仔细想想，觉得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其实，现在我的心里也时时作痛。搞政策与体制研究也 20 多年了，从 20 多年前自行车往地头一扔，下到菜地里一边帮农民拔草一边向人家了解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到今天冒着各种利益部门的“狂轰滥炸”，直言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TD-SCDMA 在实现产业化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也算是经历了些风雨。但到头来，我写的上百篇的研究报告有哪一篇能葆 5 年以上的生命力呢？我们总是跟在政策的后面去作追赶式的研究，而超前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同。就像大家现时都在讲的一句话：中国的市场化比政策体制建设的速度快，而现代技术的推出又比中国市场发展得快。于是，学者们经常会被掌控政策的人所戏弄，会被“智叟”笑谓杞人忧

天。这般下来，心怎能不痛。

但再进一步想，老话说得也有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欲速则不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笔者在给 MBA 学员讲课时曾给他们作过如下的比喻：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通俗地说，就是因为资源不足而靠资本集聚与竞争所构造的市场形态。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源有限，才会有剧烈的竞争与搏杀，就如同社会总资源的价值仅为 5000 万亿美元，而人们希望支配和拥有的资源价值远远大于 5000 万亿美元，于是，公司与公司、人与人就会像拳击手一样，不断地在一个为争 5000 万亿美元的拳击台上搏杀。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资源仍不能充分保证，但国家拥有的资本有足够的能力使拳击手按照一定的、必需的规则出拳，国家的财力有足够的能力更合理、更有效地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于是，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是在一个比资本主义多出数倍资源价值，比如是一个 500000 万亿美元的拳击台上竞技。而共产主义肯定是资源价值已超过人们需求的预期，个人责任大于个人获取，那张竞争的拳击台可能会因社会资源价值的无限大而失去竞争与搏杀的功能。笔者这样表述不同的社会形态肯定会遭到正宗、正统的经济学家们所鄙视或谴责，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形象的比喻。因此，我想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具有它的特殊性：一是拳击台的资源价值不够大，且比资本主义的拳击台还缺乏必需的资源价值；二是要推崇拳击台上的搏杀机制，但是却又比资本主义还缺少拳击的游戏规则；三是要减少浪费，要用国家有限的控制力和财力弱化拳击手间的无序伤害，做到尽可能地有计划出拳和快速出拳。这就是特殊性所在了。

由于有这样的特殊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同一张拳击台旁



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

站着两类裁判的现象：一类是仍以计划、控制、干预为评判尺度的裁判，一类是以出拳、落拳、拳姿为评判尺度的裁判。前者是靠对拳击手的控制程度来获取自己的薪酬和地位，后者是靠拳击手的搏击表演是否能得到观众的认可来获取薪酬和地位。因此，两类裁判为了生存会在拳击台下进行另一场为更激烈的搏杀。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搏杀中进行的。制度创新肯定会受到旧体制既得利益拥有者的抵抗。改革进行得越深入，新旧体制间的冲撞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就越大，传统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手段就会越加疯狂。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改革者中也会有一部分人因在改革过程中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同样会千方百计阻挠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学者们的心痛也正是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圈地运动而日趋加重。然而，更大的悲哀是一些学者也因自己的知名度而蜕变为另类的既得利益者，有人称之为“被俘获”，或是被政府俘获，或是被公司的钞票俘获。

如果笔者上面的这些描述还有点道理的话，学者们的心痛确实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因心痛而放弃自我曾遵循的准则，就只能说是做学者的过于急功近利了。对待中国的改革，不但要有耐心，更要有恒心。

尽管如此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笔者还是要对自己发问：我们已习以为常的、传统的中国的市场化还能走多远，在新形势下，特别是在国家提出“和谐社会”及初步建立福利性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究竟怎么走？

作者

目 录

第一篇 从原始积累说起

最初的积累带来了什么	(3)
带血的原始积累	(10)
疯狂的原始积累必然走向死亡	(18)
原始积累后家族公司如何突围	(24)

第二篇 从沿海民营经济说起

沿海地区：对民营经济鼓励、扶持的宏观环境日趋完善 ...	(34)
产业规模的差距，正在决定企业转型的时间表	(36)
民营企业如何从“卖产品”到“走出去”	(45)
传统的家族公司是民营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最大壁垒	(5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已不是最佳选择	(54)